

# 印度古代美术的世界意义及其 学术史考察\*

尹锡南\*\*

**【内容提要】** 印度古代美术具有非常典型的世界意义和卓越的世界地位。印度美术历史悠久且成就辉煌，它自成一体并独具特色。以犍陀罗佛教艺术、阿旃陀石窟等为代表的印度古代美术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古代艺术史。印度古代美术理论自成体系，创造了诸如宅地原人、量度、工巧等举世无双的艺术范畴。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三个世纪中，西方学者的印度古代美术研究产出了不少成果。印度本土学者虽然在时间上晚了半个多世纪，但他们深谙本土宗教文化，在印度美术研究方面作出了很多独具特色的学术贡献。中国学者的印度美术研究起步很晚，且存在某些局限，但他们仍在诸多领域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 印度美术；美术理论；工巧论；佛教艺术；建筑艺术

**【中图分类号】** J135.11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508 (2024) 02-0121-21

**DOI:** 10.13252/j.cnki.sasq.2024.02.07

印度古代历史悠久、魅力永恒的音乐、舞蹈、戏剧文化孕育、催生了独具特色且自成体系的音乐理论、舞蹈理论、戏剧理论，它们以梵语为主要载体。和印度古代音乐理论、舞蹈理论、戏剧理论一样，印度古代美术理论也是印度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度发达的宗教文化、祭祀礼仪等是印度古代美术和美术理论产生、发展的深厚“土壤”。印度美术和印度乐舞、

\* 本文为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印度古代文艺理论史”（项目编号：21&ZD275）的阶段性和成果。

\*\*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员。

诗歌、戏剧一样，有时还成为中印人文交流的最佳纽带。例如，帕拉瓦（Pallava）王朝（公元580—897年）以建志补罗（Kancipuram）为都城，这一时期兴建了一座海港城市，这便是摩诃巴利普兰（Mahabalipuram）。它也是南印度神庙建筑和雕刻艺术的中心，其中有著名的五车庙（pancaratha），这里的巨型浮雕《恒河降凡》被公认为南印度雕像杰作。2019年10月11日，访问印度的习近平主席在印度领导人陪同下，访问了摩诃巴利普兰寺庙群。<sup>①</sup> 本文先简要说明印度古代美术的世界意义，再对西方、印度和中国的相关学术史进行考察和分析。

## 一、印度古代美术的世界意义

印度古代音乐、舞蹈、戏剧的世界地位不证自明，而印度古代美术卓越的世界地位更是有目共睹。“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其艺术成就不仅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而且对亚洲诸国产生过深远影响。”<sup>②</sup> 发端于印度宗教文化和工巧技艺的印度古代美术有其独特的理论范畴和思想体系。一般而言，学术界多将绘画、雕塑（雕刻或塑像）、建筑艺术视为美术的三大门类（中国美术还存在第四个门类即书法艺术），美术理论自然也以这三个分支的理论为基础。在中国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学者们大多以“艺术”或“arts”“fine arts”指代“美术”，以“艺术理论”指称美术理论。本文以建筑艺术（即营造或工巧营造艺术）、雕刻（造像）艺术和绘画艺术等三者指称印度古代美术的内涵。

印度古代美术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古典艺术。这种世界意义或世界性至少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印度古代美术历史悠久且成就辉煌，印度古代美术自成一体并独具特色，以犍陀罗佛教艺术、阿旃陀石窟等为代表的印度古代美术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古代艺术史。

印度古代美术或曰印度古典艺术源远流长，这是有考古学证明且世人公认的历史事实。曾任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的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 1876—1958）于1922年先后主持了哈拉帕遗址和摩亨佐

<sup>①</sup> 中央广电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2019年10月12日，<https://news.cri.cn/20191012/a073b739-e685-d4ae-90bd-2212ff8f9168.html>，2024年2月15日。

<sup>②</sup> 〔美〕罗伊·C·克雷文：《印度艺术简史》，王镛、方广羊、陈聿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9页。

达罗遗址的考古发掘，后来专心主持坦叉始罗遗址的发掘。“马歇尔在哈拉帕遗址和摩亨佐达罗遗址的考古结果，将印度历史至少提早了二千多年，使整个印度学为之改观。”<sup>①</sup> 印度次大陆最早的文明，即成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存在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至前二千纪初叶，前后约 600 年。印度河文明是“古代世界最优秀的文明花朵之一，包括的地域十分广阔……其中又以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两城最为典型，也保存得最为完整”。<sup>②</sup> 论者指出：“在整个艺术发展史上，可以说印度河文明包孕着后世印度艺术的母胎，后世印度艺术在传统精神上与印度河文明一脉相承。”<sup>③</sup>

印度古代美术自成一体且独具特色。刘敦桢先生认为：“印度古代建筑亦自成一系统，虽不断受西亚影响，但仍保持着原来的传统，其生命力很强，在这一点上和中国的情况很相似。”<sup>④</sup> 美国学者指出：“在任何一件印度艺术作品中，都存在某种强烈的、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东西，那便是它的‘印度性’（Indianness）。”<sup>⑤</sup> 对于印度美术这种独特的“印度性”，王镛先生指出：“象征主义是印度艺术最显著的特征……印度艺术的象征主义，通常带有神秘主义的宇宙意识，是宇宙结构、宇宙力量、宇宙本源或宇宙生命的象征。阿育王石柱象征着宇宙之柱，桑奇大塔的覆钵象征着宇宙之卵……为了表现诸神的超人性质，印度艺术特别是印度教艺术中出现了大量多面多臂、半人半兽、半男半女的奇特怪诞的造型，象征着宇宙生命的各个不同侧面。”<sup>⑥</sup> 如结合印度宗教文化观察、思考，印度艺术的“象征主义”不仅是“宇宙结构、宇宙力量、宇宙本源或宇宙生命的象征”，更是印度宗教理念的象征。印度艺术的象征主义可视为独特的“印度性”或“印度风格”。

王镛先生还认为，印度艺术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其装饰性：“印度艺术的装饰性似乎比东西方各国艺术更显得繁缛富丽……印度艺术装饰的繁

① [英] 约翰·马歇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王冀青译，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9页。

② 刘建、朱明忠、葛维钧：《印度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46页。

③ 王镛：《印度美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④ 刘敦桢：《刘敦桢全集》（第5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⑤ Stella Kramrisch, *Indian Sculpture*, "Preface", Delhi: Motilal Banarasisdass Publishers, 2013, ix.

⑥ 王镛：《印度美术》，“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缚象征着宇宙生命的繁盛。”<sup>①</sup> 他还说：“程式化也是印度艺术的显著特征。印度艺术的人物造型一般都遵循某些固定的程式，雕塑、绘画的人物形象往往因袭诗歌、戏剧的夸张描述……早期佛教雕刻中暗示佛陀存在的菩提树、台座、伞盖、足迹、法轮等象征符号，构成了一套程式化的惯例。”<sup>②</sup> 印度古代美术的装饰性似乎与梵语诗学庄严论存在某些隐秘的关联，而其人物造型的程式化表面上看是从文学、舞蹈、宗教中提取因素，实际上，它更是印度古代美术理论和梵语乐舞论、戏剧论的一种思想交汇或通感。

印度古代美术的独特性除了上述三点外，似乎还可增加一点：印度古代美术理论自成体系，因其创造了宅地原人（*vastupurusa*）、量度（*mana*）、工巧（*silpa*）等举世无双且有丰富民族内涵的艺术范畴。该体系还存在其他一些独特之处，如建筑艺术论（工巧营造论）的总量在篇幅上大大超过雕像论和绘画论。

印度美术的世界意义还在于，以犍陀罗佛教艺术、阿旃陀石窟等为代表的印度古代艺术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古代艺术史。尼赫鲁指出：“印度文化、艺术在其他国家的神奇发展，使得这种艺术中某些杰出的表达方式可见于印度之外。”<sup>③</sup> 印度学者高善必说：“对于印度之外的数十亿人们来说，印度简直就是佛国……没有在印度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佛教主题，缅甸、泰国、朝鲜、日本与中国的艺术和建筑，乃至世界艺术，都会逊色许多。”<sup>④</sup>

从印度古代文艺整体而言，古代美术对于世界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印度古代音乐、古代舞蹈、古代戏剧或古代诗歌对其他国家的深远影响。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印度古代美术的影响似乎更为突出。在这方面，佛教美术对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古代建筑艺术的影响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印度古代美术理论的域外影响也有迹可循，如其“凹凸法”对中国古代美术产生过影响。斯里兰卡现存梵语佛教美术论著也是一个例证，这便是大约出现于公元5至7世纪的《工巧明论》（*Vastuvidyasastra*）<sup>⑤</sup> 和《绘画论》

① 王镛：《印度美术》，“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

② 同上，第8页。

③ 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2010, p. 223.

④ [印度]高善必：《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王树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9页。

⑤ E. W. Marasinghe, ed. & tr., *The Vastuvidyasastra Ascribed to Manjusri*,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89.

(*Citrakarmasastra*)。<sup>①</sup>

由此可见，印度古代美术具有非常典型的世界意义和卓越的世界地位。正因如此，迄今为止，东、西方学者的印度美术研究产出了不少成果。下文对此作一简介。

## 二、西方学者的印度美术研究述略

历史地看，西方学术界对于印度美术的接触不晚于其对印度音乐、舞蹈、戏剧的认识，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他们对于印度美术的关注稍晚于其对印度古典音乐或古典梵剧的学术考察、打量。

笔者在《印度古代音乐的世界地位及其学术史考察》一文中指出，世界上最早以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古代音乐的学者并非来自印度次大陆，而是来自欧洲。<sup>②</sup> 大约自 18 世纪晚期开始，欧洲学者开始介绍和探索印度古代音乐。相比而言，以英国学者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对印度美术的研究稍晚于他们对印度古典音乐、古典戏剧的翻译介绍或学术思考。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印度古典艺术的研究要以近代考古学发展为时代前提和文献基础，另一方面或许也与对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庙宇或相关的雕刻、壁画等的美学分析难度更大、问题更复杂有关，因为这些研究对象需要研究者长期或定期去南亚地区从事相关的田野考察（翻译和研究印度梵剧一般不需要作相关的田野考察），也要求他们在印度宗教研究方面投入更长的时间、更多的精力。

印度学者将 19 世纪以来的印度建筑研究者分为四派，依次以英国学者詹姆斯·费尔古森、印度学者 P. K. 阿查利耶、印度学者 M. 甘古里和英国学者 E. B. 哈维尔为代表。<sup>③</sup> 詹姆士·费尔古森 (James Fergusson) 于 1876 年出版了《印度与东方建筑史》第一卷。1891 年即作者费尔古森逝世 5 年后，该书第二卷出版。1910 年，该两卷本合为一卷出版。<sup>④</sup> 费尔

<sup>①</sup> E. W. Marasinghe, ed. & tr., *The Citrakarmasastra Ascribed to Manjusri*,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1.

<sup>②</sup> 尹锡南：“印度古代音乐的世界地位及其学术史考察”，《南亚东南亚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129 页。

<sup>③</sup> Nirmal Kumar Bose, *Canons of Orissan Architecture*, Calcutta: Prabasi Press, 1932, p. 1.

<sup>④</sup> James Fergusson, *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 Delhi: Low Price Publications, 2012.

古森还于1880年出版《印度石窟寺》。<sup>①</sup> 费尔古森的著作尽管具有无可置疑的开创性意义，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费尔古森极具开创意义的著作有致命的偏见，因其存在根本的误解……他根本无法解读印度艺术的象征语言。”<sup>②</sup> 印度学者 N. K. 鲍斯认为，费尔古森等人注重对印度建筑的实地考察，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其局限是以西方建筑学理论视角观察印度古建，无法根据印度本土的古代工巧营造论判断、区分印度寺庙的重要与次要因素。<sup>③</sup> 印度学者 P. 钱德拉指出：“从印度的角度看，研究印度神庙建筑更有效的一种方法是，求助于工巧论著和仍在工作的能工巧匠，以获得理解艺术的灵感。这恰恰就是费尔古森及其追随者们无能为力的事。”<sup>④</sup>

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坎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被誉为“印度考古学之父”，他在1873年发现巴尔胡特窣堵波遗址，在1879年出版《巴尔胡特佛塔》一书。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曾担任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主持过犍陀罗地区呾叉始罗古城、印度河流域古城遗址的发掘和桑奇大塔的修复。他的代表作《犍陀罗佛教艺术》出版于1960年。1989年，该书被译为汉语出版。<sup>⑤</sup> 坎宁汉和马歇尔等的著作作为研究印度美术起源奠定了考古学基础。

英国学者、曾经担任印度加尔各答艺术学院院长的佩西·布朗（Percy Brown）是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学界非常有代表性的印度美术研究者。布朗的代表作为1913年出版《莫卧儿治下的印度绘画》（*Indian Painting under the Moghuls*）、1927年出版的《印度绘画》（*Indian Painting*）、1942年出版的《佛教与印度教时期的印度建筑》（*Indian Architecture: Buddhist and Hindu Periods*）及1956年出版的《伊斯兰教时期的印度建筑》（*Indian Architecture: Islamic Periods*）。

---

① James Fergusson and James Burgess, *The Cave Temples of India*, London: W. H. Allen & Co., 1880.

② Ernest Binfield Havell,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Architecture of India: A Study of Indo-Aryan Civilization*, London: John Murray, 1915, p. 33.

③ Nirmal Kumar Bose, *Canons of Orissan Architecture*, Calcutta: Prabasi Press, 1932, p. 1.

④ Pramod Chandra, *Studies in Indian Temple Architecture, Papers Presented at a Seminar Held in Varanasi, 1967*, Bombay: American 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 1975, p. 25.

⑤ [英] 约翰·马歇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王冀青译，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英国学者、孟加拉文艺复兴倡导者之一 E. B. 哈维尔 (Ernest Binfield Havell) 是加尔各答艺术学校校长。他的著作包括《印度雕刻与绘画》(Indian Sculpture and Painting)、《印度艺术理念》(The Ideals of Indian Art)、《印度建筑》(Indian Architecture)、《古代与中世纪印度建筑: 印度雅利安文明研究》(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Architecture of India: A Study of Indo-Aryan Civilization)、《印度艺术指南》(A Handbook of Indian Art) 等。N. K. 鲍斯认为, 哈维尔的特点是通过印度建筑史考察达到对印度思想史、印度文明史的深度探析。“艺术家们利用形式表达某种思想, 建筑研究者可能对形式的历史感兴趣, 或对其试图表达的观念感兴趣。他一方面像一位语法研究者, 另一方面又像一位文献研究者。哈维尔不同于费尔古森, 他只对印度建筑的后一个方面颇感兴趣。对他而言, 建筑史成为研究印度思想史和印度文明史的一种方式。”<sup>①</sup> 这自然是对哈维尔印度美术研究的高度赞赏和褒奖。

英国学者出版的其他印度美术研究成果包括下述著作: A. 格伦威德尔 (A. Grunwedel) 于 1901 年出版的《印度佛教艺术》(Buddhist Art in India)、菲利普·罗森 (Philip Rawson) 于 1966 年出版的《印度雕塑》(Indian Sculpture)、亚当·哈迪 (Adam Hardy) 于 2007 年出版的《印度神庙建筑》(The Temple Architecture of India) 等。由此可见, 英国的印度美术研究事业后继有人, 代代相传, 这自然与他们历史上对印度的文化殖民密不可分。

犍陀罗艺术是印度美术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因为涉及希腊罗马的影响和佛像的起源问题, 特别容易引起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例如, 法国东方学家阿尔弗雷德·富歇 (Alfred Foucher) 于 1905—1923 年在巴黎出版法语著作《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艺术》。法国学者雷奈·格鲁塞 (Rene Grousset) 于 1929—1930 年出版四卷本《东方的文明》。该书第二卷《印度的文明》论及印度古代绘画、雕刻和建筑艺术及其与东南亚艺术发展的历史关系, 对于研究印度古代造型艺术及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关系而言, 它是一本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书。<sup>②</sup> 中国学者常任侠和袁音已将此书译为汉语出版。

<sup>①</sup> Nirmal Kumar Bose, *Canons of Orissan Architecture*, Calcutta: Prabasi Press, 1932, p. 4.

<sup>②</sup> [法] 雷奈·格鲁塞:《东方的文明》(上), 常任侠、袁音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年, 第 205—359 页。

与英国、法国相似，德国的古典印度学也非常发达。在印度美术研究方面，海因里希·齐默尔（Heinrich Zimmer）是一位代表。他于1955年出版两卷本英语著作《印度化的亚洲艺术：神话和变迁》。他以神话学、人类学和美学研究法介入印度美术研究。施勒伯格（Eckard Schleberger）于1986年出版关于印度教图像研究的德语著作，该书已有汉译本出版。<sup>①</sup>

客观地看，美国是英国之外研究印度美术成果最丰富的的西方国家之一。这自然与美国学者历史悠久的东方学传统和全球性视野有关，也似乎和美国当局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考量有关。奥地利裔美国学者、曾经先后担任加尔各答大学印度艺术史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的斯特拉·克拉姆利奇（Stella Kramrisch）在印度美术研究方面也享有极高的世界声誉。她的成果包括1946年出版的两卷本图文并茂的《印度神庙》，它们被视为印度教神庙研究的权威著作。她的著作还包括1933年出版的《印度雕塑》、1956年出版的《印度艺术：传统的印度雕塑、绘画与建筑》等。她还翻译了《画经》。<sup>②</sup> 美国学者本杰明·罗兰（Benjamin Rowland）于1954年出版《东西方艺术》，对印度、中国、日本与西方艺术进行比较研究。1985年，美国学者苏珊·L·亨廷顿（Susan L. Huntington）出版了多达700多页的《古代印度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艺术》，该书在美国多次重印，成为一本畅销书，2014年又在印度出版。美国学者邦斯（Fredrick W. Bunce）著述颇丰，主要致力于编纂印度艺术的各种工具书。他出版了利用图像学方法研究印度教的三卷本著作《印度教神灵、半神、小神、恶魔与英雄大全》。他还出版了《佛教和印度教图像学词典》和《佛教和印度教修为手印》等。美国学者研究印度美术的成果还有很多，篇幅所限，这里不再列举。

其他西方国家的印度美术研究也出现了不少成果。例如，近年国内学者集体翻译出版的意大利著名东方学家、藏学家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于1932—1942年撰写的《梵天佛地》四卷本（八册），是对印度古代美术与中国西藏的佛教艺术历史关系进行探索的一部重要著作。<sup>③</sup> 澳

① 〔德〕施勒伯格：《印度诸神的世界：印度教图像学手册》，范晶晶译，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

② Stella Kramrisch, *The Vishnudharmottaram: A Treatise on Indian Painting*, Calcutta: Calcutta University Press, 1924.

③ 〔意大利〕图齐：《梵天佛地》，李翎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大利亚学者乔治·米切尔（George Michell）的著作包括：1977年出版并于1988年再版的《印度神庙：意义和形式引论》、2000年的《印度艺术和建筑》。荷兰学者杰拉德·福克玛（Gerard Foekema）聚焦不同时代的印度教神庙建筑研究，其博士学位论文《建筑装饰建筑：公元1000年至1300年中世纪后期卡纳塔克神庙》于2003年出版。2006年，波兰学者斯拉切卡（A. A. Slaczka）出版《古代印度的神庙祭祀仪式：文本与考古》，该书涉及梵语工巧论著《迦叶波工巧论》的选译和研究。

西方美学者对印度美术理论的研究，以专著形式出现的较为少见，但也不乏一些例子。例如，关于印度著名的绘画理论经典即《画经》，西方学者历来甚为关注。美国学者斯特拉·克拉姆利奇于1924年出版了《〈毗湿奴法上往世书〉第三篇：印度绘画论著》。美国学者伊萨贝拉·纳尔蒂出版了《画经》研究的论著。<sup>①</sup>

法国学者布鲁诺·达冉（Bruno Dagens）在1970年至1976年间，出版了《摩耶工巧论》的两卷编订本。该译本后来一再重印。<sup>②</sup>

2005年，德国学者菲利克斯·奥特尔（Felix Otter）向国内一所大学提交涉及《工巧提要》的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该成果出版，题为《波闍〈工巧提要〉的住宅营造：导论、文本、翻译和注解》。<sup>③</sup>

一种有趣的现象是，部分西方学者选择定居印度，与印度同事合作翻译、研究印度古代美术理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祖籍瑞士的女学者爱丽丝·博内尔（Alice Boner）和祖籍奥地利的女学者贝提娜·鲍莫尔（Bettina Baumer）等。爱丽丝·博内尔和印度学者合译工巧论著《工巧光》（*Silpaprakasa*），并于1966年在荷兰莱顿出版该译本。贝提娜·鲍莫尔主编《艺术真谛宝库：印度艺术基本概念辞典》的前三卷，还与印度学者合作出版《工巧宝库》（*Silparatnakosa*）的英译本。西方学者长期参与印度古代美术研究和美术名著英译，对于印度古代美术研究的国际化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宝贵机遇。这是中国学术界面对“文化走出去”的某些困窘时需要思考、体悟的一点。

<sup>①</sup> Isabella Nardi, *The Theory of Citrasutras in Indian Painting: A Critical Re-evaluation of Their Uses and Interpret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sup>②</sup> Bruno Dagens, ed. & tr., *Mayamatam*, New Delhi: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1994, .

<sup>③</sup> Felix Otter,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in Bhoja's Samaranganasutradhar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2010.

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对于印度古代美术的研究不仅历史悠久，成果丰富，形式多样，还跨越了佛教、印度教、耆那教等诸多宗教界限。他们大多以西方的视角和艺术理论阐发印度美术，得出许多迥异于印度本土学者的结论，有的结论并不为印度本土学者所认可。当然，这种来自外部的考察和学术判断，也赋予西方学术成果诸多新意。这也是其研究成果往往受到印度、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学者竞相参考、引述的根本原因。

### 三、印度学者的印度美术研究概况

作为本土文化继承者，印度学者对于印度古代美术的研究与其对梵剧和梵剧理论、梵语乐舞和乐舞论的研究一样，必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也自然会在西方的古典印度学研究基础上展示东方学者的后发优势。下边对 20 世纪以来印度海外学者（以 A. K. 库马拉斯瓦米为例）、本土学者的印度美术研究概况进行简介。

印度的古代美术研究与其关于梵剧、梵语乐舞研究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虽然仍在时间上稍迟于西方学界相关领域的研究，但在 20 世纪初却拥有一位实力超群、身份特殊的东方学者即 A. K. 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Kentish Coomaraswamy）在美国学界“摇旗呐喊”，不仅为有时招人误解的印度古代美术正名、辩解，还为印度美术乃至整个东方艺术在西方的正确阐释、准确理解作出了历史学贡献。

20 世纪初，身为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馆长的库马拉斯瓦米在西方著书立说，宣传印度乃至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古代美术和艺术理论，以使更多的西方学者了解印度乃至东方的美术与艺术美学。<sup>①</sup> A. K. 库马拉斯瓦米生于斯里兰卡，因其有印度血统，一般视其为印度学者。他的研究成果包括《印度艺术引论》（*Introduction to Indian Art*）、《工巧天》（*Visvakarma*）、《湿婆之舞》（*The Dance of Shiva*）和《艺术本质的变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in Art*）等。对印度本土学者而言，库马拉斯瓦米的印度美术研究也具有很高的示范价值。20 世纪以来，印度学者的印度美术、印度乐舞、印度诗学研究成果，都不难发现其引述库马拉斯瓦米相关著述的痕迹。这说明，库马拉斯瓦米的学术贡献对于整个古典印度学

<sup>①</sup> 尹锡南：《印度文论史》（下），成都：巴蜀书社，2015 年，第 717—728 页。

研究而言，既是世界性的前沿或前卫探索与创见，同时也是具有民族性、东方性的一种本土关怀。

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学者的印度古代美术研究从无到有，他们的某些代表作出手不凡，受到西方学者青睐。这自然鼓励、促进了20世纪上半叶的印度学者从事古代美术研究的热情。

1947年印度独立前，从事印度古代美术研究且颇有开创性贡献或卓有成效者，包括罗摩·拉茨、拉奥（T. A. G Rao）、P. K. 阿查利耶（Prasanna Kumar Acharya）、J. N. 巴纳吉（Jitendra Nath Banerjea）、T. 巴塔查利耶（Tarapada Bhattacharyya）等学者。

世界范围内的印度古典梵语美术理论研究并非始自欧美学者，而是始自一位本土学者即南印度的罗摩·拉茨于1834年出版的《印度建筑论》。1790年，拉茨出生于南印度的坦焦尔，他的姓名“Ram Raz”暗含了维杰耶纳迦尔王朝末代皇帝的姓名罗摩罗阇（Ramaraja）。他曾在英属印度政府和军队中任职。英国学者指出：“向欧洲大众引荐一位印度人（Hindu）写的《印度建筑论集》，似乎不仅在科学史上、也在印度人自己的历史上标志着—个时代。”<sup>①</sup>拉茨说：“印度人确实拥有许多可统称为‘工巧论’（Silpasastra）的建筑雕刻论著，不幸的是，它们难觅踪迹。”<sup>②</sup>因为文献缺乏的缘故，该书只介绍了《量度精华》的重要部分。

T. A. G. 拉奥于1914年、1916年先后出版《印度图像学原理》（*Elements of Hindu Iconography*）两卷本（四册）。第一卷介绍与毗湿奴造像相关的基本原理，第二卷介绍与湿婆造像相关的基本原理。该书结合南印度工巧论著《量度精华》《摩耶工巧论》《工巧宝》等分析毗湿奴、湿婆的各类化身像原理。这凸显了印度学者结合本土文化分析古代艺术的独特优势。

P. K. 阿查利耶的代表作为围绕编订、翻译、研究《量度精华》（*Manasara*）而展开的系列七卷本，总称“《量度精华》丛书”（*Manasara Series*）。从世界范围看，关于印度古代工巧论中的营造论（建筑艺术论）名著的翻译和研究，始自阿查利耶，而非他人。由此可见，印度本土学者

<sup>①</sup> Ram Raz, *Essays on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Hindus*, “Preface”,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34.

<sup>②</sup> Ram Raz, *Essays on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Hindus*,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34, p. 1.

在保护、继承和阐释民族文化经典方面，发挥了自己在语言和文化理解方面的独特优势。或许正因如此，D. N. 苏克拉把 P. K. 阿查利耶称为“现代印度古典建筑学之父”。<sup>①</sup>

1941年，J. N. 巴纳吉出版《印度图像学发展》。该书系统研究印度图像学发展的某些规律或特点。它对印度古代图像（造像）的系统论述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性意义。

1947年，T. 巴塔查利耶出版《印度工巧论或建筑法研究》。该书于1963年修订再版，书名变为《印度艺术法则或工巧论研究》。<sup>②</sup> 1963年出版的该书修订本主要是增加了一章，论述工巧论中的雕像论和绘画论。该书围绕印度古代两大建筑流派或曰建筑理论流派，结合《工巧宝》《工巧要诀》等梵文经典，介绍了古印度南北两派建筑理论的各种原理，并总结出它们相同的18个特点。巴塔查利耶此书可以视为20世纪上半叶印度学者、乃至世界学界系统研究印度古代美术论的一座高峰或里程碑。

印度独立以来的70多年间，印度本土学者对于印度古代美术的研究热情不减，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其语言媒介自然以英语为主，但也包括以印地语等印度现代语言撰写的学术成果。

就印度古代美术理论发展史梳理而言，印度学者D. N. 苏克拉于1958年出版的《工巧论·第二卷：印度造像与绘画论》、于1960年出版的《工巧论·第一卷：印度建筑学》特别重要。这两本著作问世以来，已经多次再版重印。苏克拉不仅分析了印度古代营造论分为两派的理论依据和历史原因，还叙述了印度古代营造论的五种原则：方位论、相地法、量度法、工巧六法、工巧六律。<sup>③</sup> 苏克拉的两卷本专著可以视为印度古代美术研究的百科全书，是研究印度古代美术理论或印度美术史的学者无法忽视的存在。

瓦赞娑（Kapila Vatsayayan）既是印度古典舞蹈和戏剧的重要研究者，也是印度古代美术研究的热心者。她的相关著作包括《印度绘画中的舞

---

<sup>①</sup> D. N. Shukla, *Vastu Sastra, Vol. I, Hindu Science of Architecture*,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2008, p. 154.

<sup>②</sup> Tarapada Bhattacharya, *The Canons of Indian Art or A Study on Vastuvidya*, Calcutta, Firma K. L. Mukhopadhyay, 1963.

<sup>③</sup> D. N. Shukla, *Vastu Sastra, Vol. I, Hindu Science of Architecture*,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2008, p. 179.

蹈》<sup>①</sup>、《喀拉拉地区的艺术》<sup>②</sup>、《印度艺术方与圆》<sup>③</sup>等。1988—2015年，在瓦赞媯的主持下，印度和西方学者合作研究成果《艺术真谛宝库：印度艺术基本概念辞典》出版了7卷，其中的第5卷是关于印度古代美术理论10个重要概念的阐释，涉及线条、神像、化身像神庙等。其他各卷如第1、2、6、7卷均收录了阐释古代美术理论核心概念的词条。<sup>④</sup>瓦赞媯女士还主持了大型的跨世纪工程“艺术基本理论丛书”系列，其第一卷出版于1988年，2017年出版第67卷，即《工巧庄严》。<sup>⑤</sup>这套大型丛书未来还将出版涉及印度古代美术论在内的多种梵文经典。

印度独立以来，部分学者继承了库马拉斯瓦米的图像学研究方法，对印度古代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作了多角度的研究，它们对于研究印度古代美术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著作包括V. G. 斯塔帕蒂（V. Ganapati Sthapati）以泰米尔语写成且被英译后于2002年出版的《印度雕塑与图像》（*Indian Sculpture and Iconography*）等。《画像量度经》的梵文本现已失传，其藏语译本被当代印度学者译为英文。该译本的底本是德国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于1913年在莱比锡出版的附有长篇序言的《画像量度经》藏文编订本，它源自中国西藏的大藏经《丹朱尔》。

印度佛教艺术也是印度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例如，著名学者洛克希·钱德拉（Lokesh Chandra）主编并于1999—2005年出齐的15卷本《佛教图像学词典》<sup>⑥</sup>为东西方印度美术研究界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料和信息。他于2012年出版的合著《新德里国家博物馆藏敦煌佛教绘画》<sup>⑦</sup>等同样值得关注。

① Kapila Vatsyayan, *Dance in Indian Painting*, New Delhi: Abhnav Publications, 1982.

② Kapila Vatsyayan, *The Arts of Kerala Kshetram*, New Delhi: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2015.

③ Kapila Vatsyayan, *The Square and the Circle of the Indian Arts*, New Delhi: Roli Books International, 1983.

④ Bettina Baumer, et al., eds., *Kalatattvakosa: A Lexicon of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the Indian Arts*, Vols. 1-7, New Delhi: Indira Gandhi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1988-2015.

⑤ Sutradhara Mandana, *Vastumandanam*, New Delhi: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2017.

⑥ Lokesh Chandra, *Dictionary of Buddhist Iconography*, Vol. 1-15,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ashan, 1999-2005.

⑦ Lokesh Chandra and Nirmala Sharma, *Buddhist Paintings of Tun-Huang in the National Museum, New Delhi*, New Delhi: Niyogi Books, 2012.

多年以来，印度学术界注重以国际学术会议的方式，邀请世界各地的学者，共同探索印度美术各个领域，将古典印度学国际化，从而保证不偏离 19 世纪以来印度美术研究的国际化路径。这是值得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一点。随着印度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印度美术研究国际化的这种趋势不会改变，其步伐或许会迈得更快。因为历史上佛教和佛教艺术东传的缘故，中国与印度古代美术的关系历来是国际东方学界的一大热点，如何寻找中国美术研究国际化与印度美术研究国际化的更多“交集”，似乎可以纳入国内学者的思考视野。

综上所述，印度学者既是印度古代美术研究的拓荒者，也是西方相关领域代表人物的模仿者或超越者。他们不仅直接进入梵语工巧营造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领域，还以自己对本土宗教文化的理解优势后来居上，切入印度古代美术研究的核心和腹地，为后来的印度本土学者、欧美学者及中国、日本、南亚、东南亚、西亚、中亚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足资借鉴的范本。

#### 四、中国学者的印度美术研究述略

中国学者对印度古代美术的研究起步很晚，落后于欧美学者和印度学者。中国学者的相关成果，主要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印建交以后。常任侠和王镛等是印度美术研究领域的代表。

在印度古代美术研究方面，曾经在印度国际大学任教的常任侠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拓荒者。他的《中印艺术因缘》（1955 年）、《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1980 年）、《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1981 年）、《东方艺术丛谈》（1984 年）等是这一领域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常任侠主要参考《印度的文明》编著的《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 年）填补了当时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sup>①</sup> 常先生这本书虽是编著，但质量上乘，对于启蒙中国的印度美术爱好者和专业研究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常先生在印度古代美术研究方面是一位优秀启蒙者的话，他的弟子王镛先生则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王镛在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印度美术

<sup>①</sup> 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年，第 219 页。

及其历史发展规律、探讨中印古代美术交流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著作包括《印度美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世纪印度美术》《中外美术交流史》等。《印度美术》借鉴前述的印度与西方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对印度古代美术进行分期研究：古代早期、贵霜时代、笈多时代、中世纪、莫卧儿时代。他以婆罗多的八味论阐释阿旃陀壁画令人耳目一新。<sup>①</sup>王先生既以西方的几种风格论（古风、古典主义、巴洛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等）解释印度古代美术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又以梵语文艺理论的味论、韵论解释阿旃陀壁画等，这显示了他在研究方法上融汇了东西方文艺美学的精髓。他在书中将印度美术的造型特征归纳为象征性、装饰性和程式化三点，这基本上符合印度古代美术的发展规律。

佩西·布朗（Percy Brown）在1918年出版的《印度绘画》一书中，推测中国南齐画家谢赫的《画品》提及的“绘画六法”可能源自印度的“绘画六支”，后者可见于《爱经》的后世注疏（13世纪）。布朗说：“中国早期艺术家们在施展画艺时也同样采用‘六法’。6世纪的谢赫最早提及它。除了许多相同的法则外，还有一点是肯定的：两套法则大体上旨趣相同。中国六法晚出许多世纪，这暗示其原本借鉴了更为古老的印度体系。”<sup>②</sup>布朗的说法似乎影响了某些西方学者。例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印度和中国的绘画在两国的文化中都是享有盛名的。据说，谢赫在480年前后所阐明的绘画六法（六品），和较早时印度著作中所说的相同。”<sup>③</sup>王镛先生在《印度美术》一书中，对佩西·布朗的上述说法提出质疑。王先生和前辈学者金克木先生一样，否定了布朗的上述观点。王先生指出：“至于印度的六支与中国的六法仅仅是在数字上偶然巧合而在内容上互不相关，抑或属于各自平行的发展，还是尚待深入探讨的课题。”<sup>④</sup>

20世纪中后期至今，中国学术界还有一些学者不同程度地关注印度美术研究。著名梵学家金克木先生和著名建筑史学家刘敦桢先生便是其中的两位。

金克木对于印度美学和绘画论相当感兴趣。他的一些论文涉及印度古

<sup>①</sup> 王镛：《印度美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5-201、208-214页。

<sup>②</sup> Percy Brown, *The Indian Heritage: Indian Painting*, Calcutta: The Association Press, 1927, p. 21.

<sup>③</sup>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袁翰青、王冰、于佳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22页。

<sup>④</sup> 王镛：《印度美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

代美术或美学研究。金先生指出，英国学者布朗关于“绘画六法”和“绘画六支”的关系的说法有误，因为他误认为印度的“绘画六支”说出现在公元3世纪至5世纪，但“绘画六支”的诗体歌诀并非源自《爱经》或曰《欲经》的文本，而是出现在关于《爱经》的一种注疏即“胜利吉祥注”中，年代在13世纪，远在5世纪的谢赫之后。“5世纪的人怎么能抄袭13世纪的书呢？何况《欲经》本身的年代也没有确定，也可能是在5世纪左右，也不是作为同在5世纪的谢赫从印度学来‘六法’的证据。”<sup>①</sup>金先生还说，虽然不能证明中国“六法”出于印度“六支”，却也不能说“中国和印度的古代美术界不会有理论方面的接触”。<sup>②</sup>他的结论是：“可见‘六法’与‘六支’不是一事，就现有的原始材料而论，大概只能这样说。”<sup>③</sup>

刘敦桢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与东方建筑史研究。“在中国，研究印度建筑的倡始者是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sup>④</sup>1928年，刘先生在论文《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中说：“故自佛教东来以后，我国建筑受此文化之浸濡，实甚深广。”<sup>⑤</sup>刘先生以印度舍利塔、寺庙和石窟等为例，说明佛教文化对中国建筑影响时间不算太长：“其最初模仿印度者，不出数百年间，亦演绎同化于中国建筑之内。”<sup>⑥</sup>刘先生在1937年发表两篇短文，对清代工布查布翻译的《造像度量经》作了简介，称其为“现存佛教工巧明三大典籍之一，治密宗造像者，皆奉为惟一法典”。<sup>⑦</sup>他还提及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并感慨不已：“愚读《造像度量经》后，再获此篇，不禁叹布氏<sup>⑧</sup>之后，二百年间继起乏人，坐令异邦学子为之发扬光大，良可慨已。”<sup>⑨</sup>1959年1月至2月，刘先生访问印度，实地考察了那烂陀、鹿野

① 金克木：《印度文化余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90页。

② 同上，第93页。

③ 同上，第96页。

④ 汪永平、孙晨蕾：《南印度印度教神庙建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⑤ 刘敦桢：《刘敦桢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⑥ 同上，第3页。

⑦ 刘敦桢：《刘敦桢全集》（第3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

⑧ “布氏”即工布查布。

⑨ 刘敦桢：《刘敦桢全集》（第3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

苑、阿旃陀石窟等建筑圣地和壁画遗迹。<sup>①</sup> 1963年，刘敦桢先生草成部分教案初稿，这便是后来面世的《印度古代建筑史》（未完稿）。他认为：“印度古代建筑亦自成一系统……因此，研究古印度的建筑，就不能不涉及到宗教问题。”<sup>②</sup> 刘先生从印度宗教入手观察和思考印度古代建筑，并重视实地考察印度古建，着手培养研究印度古代建筑的梯队人才，这些举措在20世纪中后期确属“空谷足音”，难能可贵。

梁思成（1901—1972）认为，印度古建的台基轮廓及雕饰影响了中国古建，须弥座因此输入中国。<sup>③</sup> 他还认为印度的须弥座源自古希腊罗马的台基营造艺术，其对中国的影响，印度是一个中介。<sup>④</sup>

部分中国学者将印度古代建筑视为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之一。例如，萧默指出：“印度建筑艺术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中国建筑、西方建筑一起，构成最重要的世界三大建筑体系。”<sup>⑤</sup> 在他主编的《中国建筑艺术史》中，提到了南印度两部重要的梵语工巧论著《量度精义》和《工巧宝》。“关于印度塔庙的建造技艺，许多梵文文献都提到过‘工巧学’（Silpa Sastra）。印度雅利安人需要掌握的三十二种科学和六十四种技艺，‘工巧学’即包含在这三十二种科学里……工巧学中还有一篇‘拉特那工巧’（Silpa Ratna），专论楼阁的十八种类型，将楼阁式塔庙分为七种，主要涉及南印度被称为毗玛那型（Vimana）的塔庙。”<sup>⑥</sup> 该书认为，中国佛塔有两大类型，即楼阁式与密檐式。“关于楼阁式塔，学界已广泛承认是源于印度悉堵波式塔和中国汉代楼阁（重檐），密檐式塔的渊源也可能与印度有关。”<sup>⑦</sup>

中国大陆的少数学者关注印度古代美术时，中国台湾的少数学者也在关注，并出版了相应的成果。例如，晓云法师（游云山）于1956年出版

① 刘敦桢：《刘敦桢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215—230页。

② 刘敦桢：《刘敦桢全集》（第5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③ 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238页。

④ 同上，第239页。

⑤ 萧默：《天竺建筑行纪》，“引言”，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1页。

⑥ 萧默主编：《中国建筑艺术史》（上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219页。

⑦ 同上。

《印度艺术》。<sup>①</sup> 1993年，中国台湾学者高木森出版《印度艺术史概论》。<sup>②</sup> 高木森的一本英文著作也被汉译，出版时题为《亚洲艺术》。印度古代艺术在其中占有显著的地位。<sup>③</sup> 中国台湾学者金荣华于1993年出版《敦煌吐鲁番论集》，其中的《印度访画记》和《新德里印度博物馆藏“壬寅闰四月”敦煌卷子跋》提供了有价值的一手信息，透露了20世纪被英国人斯坦因盗取而被印度所藏的中国敦煌艺术品的某些真实情况。<sup>④</sup> 这为学者们研究中印现代美术交流提供了参照。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在印度美术研究、印度古典梵语美术理论翻译和研究领域，开始全面发力，从而呈现出与20世纪完全不同的一种局面、一派气象。一些青年学者开始登上舞台，尤其是几位通晓梵语的学者，开始从古典梵语一手文献进入印度古代美术理论翻译和研究领域，其成果先后出版或发表。

在印度古代工巧艺术论研究方面，青年学者池明宙成长非常迅速，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学界长期存在的一些空白。他有长期访学印度的丰富经历，通晓英语、梵语，擅长结合文献学、建筑史和科技史的分析方法，研究印度古代建筑和美术理论。池明宙公开发表的论文有《“名颜”面饰艺术与南亚建筑身体观的视觉化构成》（《文艺研究》2022年第12期）、《天宫中的“胎室”：印度教神庙空间序列之解读》（《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6期）、《印度方位观、方位神和神庙朝向关系初探》（《科学文化评论》2018年第1期）等。

除了池明宙，还有几位青年学者也值得一提。例如，段南发表的论文《再论印度绘画的“凹凸法”》<sup>⑤</sup> 值得关注。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顾颖于2017年发表的论文即《论西域样式凹凸法与天竺遗法》。<sup>⑥</sup> 吴蔚琳的论文《斯里兰卡大乘佛典〈画业论〉的造像泥塑技法考辨》在国内首开先河，

① 晓云法师：《印度艺术》，台北：水牛出版社，出版年代不详。

② 高木森：《印度艺术史概论》，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3年。

③ 高木森著，潘耀昌、章立国、陈平译：《亚洲艺术》，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1年。

④ 金荣华：《敦煌吐鲁番论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91—96、135—139页。

⑤ 段南：“再论印度绘画的‘凹凸法’”，《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

⑥ 顾颖：“论西域样式凹凸法与天竺遗法”，《敦煌研究》，2017年第2期。

介绍了斯里兰卡梵文工巧艺术论经典。<sup>①</sup>

近年来，国内学术期刊偶尔登载研究印度古代美术的论文，除了前述的池明宙和段南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发表了相关的论文。例如，单军的《新天竺取经：印度古代建筑的理念与形式》<sup>②</sup>和朱思隆的《扩展与压缩：印度建筑中支提拱的形式演变》便是对印度古代建筑艺术的具有新意的探讨。<sup>③</sup>

在引领学术群体进行印度美术乃至东方美术研究方面，北京大学陈明教授成绩突出。他早年研究印度传统医学（阿育吠陀）和中印佛教文化交流、梵文佛教和汉译佛经等。近年来，他逐渐转向印度和东方美术研究，并培养了钟情于古典梵语美术理论翻译和研究的池明宙和段南等青年学者。他近年来发表的相关论文包括《汉译密教文献中的画像仪轨初探》<sup>④</sup>、《古代东方文学的图像传统初探》<sup>⑤</sup>等。据悉，陈明教授组织、由池明宙和段南等负责翻译的几部印度和斯里兰卡古代美术论名著即将出版。

青年学者李颖于2016年出版著作《“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sup>⑥</sup>她以印度《摩耶工巧论》（*Mayamata*）和印度宗教文化知识为依据，对柬埔寨的印度教神庙即吴哥寺（Angkor Wat）“翻搅乳海”的造型艺术作了深入的探索。这是以印度古代美术理论探索印度与东南亚国家古代文化关系的新尝试。

2017年，南京工业大学汪永平教授与人合著的《南印度印度教神庙建筑》<sup>⑦</sup>填补了中国学术界在南印度神庙建筑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在此之前即2013年和2015年，汪永平教授指导的硕士生沈亚军、孙晨蕾先后完成了与印度教神庙建筑研究相关的两篇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四川大学博士生杨旭彪完成了世界史博士学位论文《6—9世纪的印度教神庙研究》。<sup>⑧</sup>

① 吴蔚琳：“斯里兰卡大乘佛典《画业论》的造像泥塑技法考辨”，《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5期。

② 单军：“新天竺取经：印度古代建筑的理念与形式”，《世界建筑》，1999年第8期。

③ 朱思隆：“扩展与压缩：印度建筑中支提拱的形式演变”，《文艺研究》，2022年第12期。

④ 陈明：“汉译密教文献中的画像仪轨初探”，《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6期。

⑤ 陈明：“古代东方文学的图像传统初探”，《国外文学》，2016年第1期。

⑥ 李颖：《“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⑦ 汪永平、孙晨蕾：《南印度印度教神庙建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⑧ 杨旭彪：《6—9世纪的印度教神庙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犍陀罗佛教艺术历来是中国学者的一个研究热点和重点。在犍陀罗艺术研究方面，深圳大学蔡枫副教授发表了论文《印巴犍陀罗艺术研究的三个阶段》<sup>①</sup>、《犍陀罗佛传雕刻的视觉叙事》<sup>②</sup>等。

泉州是中国国内仅有的保存印度教石刻像的沿海城市。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研究馆员王丽明女士先后发表论文《泉州印度教石刻研究回顾与思考》<sup>③</sup>、《元代泉州印度教龕状石刻纹饰辨析》<sup>④</sup>和译文《泉州印度教石刻艺术的比较研究》<sup>⑤</sup>，对泉州印度教石刻像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介绍和分析。

在研究中国古代佛教艺术、藏传佛教美术与印度美术关系方面，四川大学李翎研究员先后出版了《佛教造像量度与仪轨》《佛教与图像论稿》《佛教与图像论稿续编》《鬼子母研究：图像、经典与历史》等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发表论文《中国传统艺术造像量度与古代文化交流》<sup>⑥</sup>等。李翎上述成果为研究印度美术理论及中印古代美术理论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外，罗秉芬汉译的两种著名的古代藏语美术理论经典即《如来佛身量明析宝论》和《彩绘工序明鉴》以《西藏佛教彩绘彩塑艺术》为题于1997年在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藏传佛教美术曾经受到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非常丰富。例如，尕藏编译的《藏传佛画度量经》收录了13世纪至19世纪的17种藏语佛教美术理论经典著作的目录，其中包括《如来佛身像度量如意宝珠》《八佛塔之度量》和《佛像度量经》等。<sup>⑦</sup>这部著作作为藏传佛教美术理论和印度佛教、印度教美术理论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近年来，笔者不揣浅陋，译出《画经》和《工艺宝库》<sup>⑧</sup>等梵语美术

① 蔡枫：“印巴犍陀罗艺术研究的三个阶段”，《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

② 蔡枫：“犍陀罗佛传雕刻的视觉叙事”，《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3期。

③ 王丽明：“泉州印度教石刻研究回顾与思考”，《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1期。

④ 王丽明：“元代泉州印度教龕状石刻纹饰辨析”，《南亚东南亚研究》，2022年第6期。

⑤ 〔美〕余得恩：“泉州印度教石刻艺术的比较研究”，王丽明译，《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⑥ 李翎：“中国传统艺术造像量度与古代文化交流”，《美术观察》，2020年第9期。

⑦ 尕藏编译：《藏传佛画度量经》，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235—237页。

⑧ 〔印度〕宾伽罗等撰：《印度古典文艺理论选译》（下），尹锡南译，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第804—836、840—919页。

论名著，发表《〈毗湿奴法上往世书〉中的文论与画论》<sup>①</sup>和《〈工艺宝库〉：一部重要的梵语建筑艺术论著》<sup>②</sup>等论文。这些成果还存在诸多的不足，期待未来进一步完善。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在佛教艺术等涉及中印古代美术交流的领域，具有语言释读和文献丰富等天然优势。不过，印度古代美术与中国的历史关联还存在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敦煌石窟艺术和壁画蕴含的印度宗教思想与古典美学要素。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一点的著作近年来先后出现。值得继续展开探索的重要议题还包括印度建筑艺术和绘画、造像原理对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影响等。毋庸讳言，国内相关领域学者绝大多数尚未上升到自觉地运用印度古代美术理论进行分析、研究的理想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古典梵语美术理论著作尚未得到全面、系统的翻译造成的，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长期不重视印度教美术理论的研究密切相关，这是国内学者与印度、西方同行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当务之急是对丰富多彩的梵语美术理论著作进行有计划的翻译和研究。总体上看，中国学者的印度美术研究起步很晚，且存在上述局限，但我们也有一些潜在的优势领域，如中印佛教美术比较等，只要我们认清形势，发现薄弱环节和学术空白，找准发力点，高度重视梯队人才培养与中外学术交流等，我们就会拥有值得期待的学术前景。

综上所述，印度古代美术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和卓越的世界地位。在当前大力提倡“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印度美术和印度乐舞、戏剧等，将为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等提供诸多有益的文化信息和重要参考。因此，学者们须在相关领域潜心探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sup>①</sup> 尹锡南：“《毗湿奴法上往世书》中的文论与画论”，《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3期。

<sup>②</sup> 尹锡南：“《工艺宝库》：一部重要的梵语建筑艺术论著”，《南亚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4期。

th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since 2005,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significantly upgraded its low-carbon technology, and reduced the implied carbon transfer borne by China. This finding is robust in the empirical test of the study, and the impact is greater in high-carbon and low-tech manufacturing.

### Developments, Risk Assess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Islamic Finance in Pakistan

Chen Can

With the rise of Islamic countries, Islamic finance based on the teachings of Islam has become a global forc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world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 closer China-Pakista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nd financial reform in Pakistan, we are not only fully realizing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Islamic finance, but also objectively analyz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prevention of Pakistan's Islamic finance.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ic finance in Pakistan on China, to better grasp the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ic finance and make it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projec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rigin, development status, and risk assessment of the Islamic financial system in Pakistan, as well as th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t brings to China, and make some meaningful suggestions.

### Studies on the World Role of the Fine Arts in Ancient India and Its Academic History

Yin Xinan

The fine arts or so-called *vastu*, *silpa* and *citra* in ancient India hol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arts and human civilization. With its brilliant achievements and unique artistic features, the time-honored Indian fine arts, represented by the Buddhist arts of Gāndhāra and Ajanta Caves, have deeply influenced the ancient art history of the world. Because of its unique creations of the incomparable artistic categories, particularly the concepts of *vastupurusa*, *mana* and *silpa*, etc., Indian ancient art theory has its own Indian

characteristic system. Since mid-19th century, Western scholars have achieved tremendously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Indian arts. While in India, though started about half a century later than their European counterparts, Indian scholars have made themselves distinctive in the study of Indian Fine Arts with their unique academic contributions. Compared with the studies in the West and India, studies of Indian fine arts in China initiated much later, but they still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in many fields.

###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Pattern of People-to-Peopl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Based on Culture and Tourism Cooperation

Wang Haiyan, Chen Ruihua

As the high-quality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CPEC enters a new stage,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people-to-peopl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based on culture and tourism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trengthening the all-weather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orking together to build a closer China-Pakist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new era.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logic of people-to-people communication based on culture and tourism cooperation, and elaborates on the main problems and reasons of people-to-peopl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from the practic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It points out that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CPEC, a new pattern of people to peopl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should be constructed, with cultural exchange as the core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cooperation, subject communication as the focus to expand the field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cooperation,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as the suppor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cooperation, recognition effects as the support to play the role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cooper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social public opinion foundation of the CPEC.